

局長隨筆

剛到合肥出席了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的活動。對這個體育大會，相信很多人不熟悉，我也是出席活動之後，才增加了認識的——不但增加了對這個體育大會的認識，也增加了對普及體育運動的認識。

對於運動會，我們最熟悉的相信是奧運會了，熟悉它的歷史、形式、成績、項目等等，其他的運動會都有它的影子，爭取的是「更高、更快、更強」。它的獎牌有最高的「含金量」，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這是精英運動員的比賽。

奧運會，還有其他層次的運動會如亞運會、遠東運動會、全運會等，雖然觀眾不少，但能夠達到參賽標準的，只有少數精英運動員。精英運動員代表着一個地方的最高運動水平，對社會能起激勵士氣的作用，每個地方都重視培養。香港也一樣，特區政府近年在這方面做了不少資源調配，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取得不錯的成績，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朝着更高的目標前進。另一方面，與培養精英運動員並行不悖的是，我們要推動體育運動的普及，讓更多市民參與不同形式的體育運動。體育運動其實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可以容納很廣泛的參與。這次到合肥，我就有大開眼界之感。

第一是不少比賽項目很新鮮有趣，如三人籃球、橋牌、象棋、龍舟、舞龍舞獅、攀岩、毽球、航空模型等，比賽項目達34個大項、318個小項，參加人數過萬。

一次快樂的運動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這些都是市民平時愛做的運動，但不在奧運範圍內。

第二是比賽的氣氛不同。在精英運動比賽中，大家都對代表著最高榮譽以至經濟利益的獎牌十分重視，比賽氣氛很緊張，競爭激烈。可是體育大會的比賽有很強的趣味，很多比賽項目本來就是民衆平常的娛樂活動；比賽中，比賽的與觀看的，都帶着愉悅的心情。賽場中少了緊張，多了歡樂。快樂，正是這次體育大會要達到的重要目標。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運動會的開幕講話中說，本次體育大會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創新，改革方向和目標，是努力實現「淡化金牌、淡化錦標、重在參與、重在交流、重在健身、重在快樂」。這使本屆體育大會有別於去年在濟南舉行的全運會，那是奧運項目的精英化比賽，而全國體育大會為非奧運項目比賽，走普及化、群衆化道路。

香港也派出了近百位運動員參與其中19個項目的比賽，最年長的運動員為航空模型運動員李洪基，年齡58歲，最年輕的是高爾夫球運動員張穎怡，年齡14歲。我與運動員的接觸中明顯地感到，他們很愉快，與參與精英運動比賽運動員的心情不同。

這樣的比賽對我們推廣體育運動應該有啓發。體育運動的開展應當分不同層次進行，不應互相排斥，而應該互相推動。對於公衆來說，他們既需要精英運動帶來的激勵，也需要各種普及運動帶來的快樂和享受。

港事講場

香港經濟離不開國際政治

楊漢群

很多港人認為香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應「只談經濟不談政治」，國際政治更是「關我乜事」。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在香港經濟的發展歷程上，國際政治自始至今都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港人不可不察。

國際政治導引百年經濟

十九世紀是西方殖民擴張的高潮，1841年，英國人在鴉片戰爭期間登陸香港島，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次年《南京條約》簽署，清朝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此後，英人在香港大力發展貿易，為本國的利益服務，揭開了香港近代經濟發展的序幕。可以說，香港近代經濟乃肇始於西方殖民擴張和清英角力這個國際環境之中。

由割讓至1949年，香港成為歷屆中國政府，包括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角力場。當中一些重大事件對香港當時的經濟以至往後發展有巨大影響。例如1925至1926年期間，由中共發動、廣州國民政府支持、以英帝國主義為鬥爭對象，歷時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就一度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迫使英國撤換港督和調整治港政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隨即對其打壓、孤立、圍堵，將英治下的香港、國民黨治下的台灣、韓國、日本、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等視為冷戰博弈的棋子，組成圍堵中國大陸的包圍圈。為了加強這些「棋子」的圍堵力量，美國遂全力支持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以至後來出現了日本的經濟超強和港、台、韓、星的「亞洲四小龍」。

由於香港接鄰中國內地，地位更顯特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為打破孤立，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以香港作為對外接觸的重要窗口，暫時容忍英人繼續治港；同時，西方亦利用香港這個中國南方的窗口，窺探內地情況。在冷戰時期，國家和西方都需要香港，大家都希望維持香港當時的狀況，故中國不管如何困難、與英國關係如何起伏，都堅持向香港供應廉價食物和食水；西方則視英治下的香港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對香港開放市場，讓香港透過勞力密集的低端技術輕工業產品得以銷售，賺取可觀外匯。故此，戰後香港經濟起飛，與冷戰實有密切關係。

1978年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由於中國當時發展水平較低，又是第一人口大國，改革開放等於啟動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廉價勞動群體。西方遂調整全球經濟分工，將勞力密集的低端技術工業生產轉往中國，自身則加速發展金融及其他高端產業，同時至今仍然嚴格限制高端技術輸往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成為國際分工的中轉站，協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多年，香港充分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配合西方的市場，逐漸將本地經濟由以輕工業帶動轉型至以金融、地產、服務業為主導。可是，香港獲利豐厚的同時，也出現產業空洞化、資產容易泡沫化

中國開始為人民幣升值部署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劉煜輝

名家指點



劉煜輝

對於當下的美國，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政策當然是弱美元。

弱美元增加美國製造的競爭力，縮減經常專案赤字，可以說，當危機摧毀了美國的淨需求——金融消費之後，美國今天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出口驅動型增長了。

歐債危機促人民幣升值

弱美元使得美國龐大的對外投資隨着美元貶值而獲得巨大的資本盈餘，最快速地降低國家淨債務率。

更關鍵的是，美國經濟走出再平衡唯一的方向是再工業化，不是美國的海外工廠的回歸，而是再造一個的新工業體系，弱美元能整體抬高傳統工業領域的運行成本，換句話講，只有傳統的資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大量的投資源源不斷地進入所謂低碳的新經濟形態，並充分保證這些投資的安全。

坦率地講，人民幣盯住美元曾經為美國人「反危機」立了功，當美元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對美債「不拋棄、不放棄」是美元最大的支撐。

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想到，歐洲人軟肋這麼快暴露：經濟疲弱、債務惡化；在危機的衝擊下，「只有統一的央行，沒有統一的財政部」的所謂貨幣同盟區是多麼的漏洞百出。

於是，歐元狂貶的對沖——美元強勁，使得美國一季度的增長動力受到很大的威脅，此時人民幣盯住反而成了弱美元政策執行的最大障礙，人民幣恢復兌美元的升值，美元才能止住升勢，美國的出口或能喘口氣。

有人說，歐洲的債務危機使得中國政府會延緩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在我看來，恰恰相反，當下來自美國的外部壓力可能反而更大，隨着

歐元跌，美元不斷升。

匯率升值將擠出資金

從國內看，從理論上講，一國實際匯率的上升，要麼通過名義匯率的升値來做平等式，如果沒有從名義匯率上反映出來，它必定會表現為國內通脹的上升。而國內非貿易部門如房地產或者服務業價格的大幅上漲則是這種通脹表現的常態。這便是國際經濟學著名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於是匯率成了調控手段。通過名義匯率調整（更準確地講就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來給國內的資產泡沫降溫。

但「巴薩」的「蹺蹺板」效應能否見效，取決於當名義匯率升値以後，該經濟體的既有結構是否足以支援貿易部門的資源如願地向非貿易部門轉移。

當下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在中國是缺失的。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傳媒等等，受到「壟斷」力量的控制，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

實際情況可能還遠不止於此，當下國有部門依託着「反危機」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資源和資本的空前優勢」，大肆進入第二產業中攻城掠地。

可以想見，匯率升值而致貿易部門擠出來的資金，將會只有兩個去向，一是短時間內大量湧入虛擬，資產泡沫再進一步做大；二是向外



圍繞人民幣升值的博弈日趨複雜。

熱門話題

「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好

仁人

由5月1日開始，商業電台連續18個周六凌晨2時至6時，在商業一台和二台聯播「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該節目得到民建聯的贊助，其成員理所當然地獲邀擔任客座主持，並與商台主持到十八區夜蒲點探訪夜間流連在外青少年。此種關心「夜青」的活動，說明民建聯的工作落實到了社區的屋邨和街頭巷尾，落實到「雙失」的青少年身上，是值得支持、讚許的舉措。

首先，民建聯贊助此段時間的訪問和聯播，是既不擾民，又有的放矢的做法。衆所周知，

由於香港教育方針只重考試、分數、升學，將品德教育放在可有可無的地位；又加上學校因「標籤」效應只顧用填鴨式教學，使在學學生缺乏遠大志向和正確人生觀，面對功課壓力，意志薄弱者容易消沉、自暴自棄，使黑道勢力乘虛而入，引誘他們走歪門邪道；又以搜交、毒品加以引誘，於是三五成群流連酒吧，流落街角，或傾訴於屋邨天台，或露宿於公園不返，成為文明都市的瘡疤，香港社會的隱患。民建聯關注他們，愛護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尋找解決的方法，引導他們走上正途，這不是值得學校、家長、社會支持的舉措麼？

其次，民建聯此舉，也慰撫了教師、家長的心坎。屯門安定邨一位家長說：「幾好哇，常有逃學細路深夜在天台喧譁擾人安眠，應該勸他們返屋企」。另一位住天水圍的朋友感激夫妻為生活奔波無暇教導兒子，致他缺乏溫暖誤交損友。教師方面也透露心曲：教學辛苦，育人無術，義工太少，幫不到位。現在民建聯用此「十八仝人愛落區」方法



民建聯與商台合辦深宵節目，引來一片熱議。

來論

矛盾的香港人

千里雪

港大民意調查新近公布，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香港人對新加坡政府最有好感，佔57.4%，對其餘國家或地區政府有好感的只佔8.3%至41.8%不等。其實，這個調查已做了不只一年，而新加坡政府受認同的程度多年來都領先位置。

說到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提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他在新加坡獨立後不久，經過放學的隊伍時想到學生快要畢業，他得扛起他們的就業問題，於是新加坡政府直接招商，大至船塢，小至羽毛球工廠，官員都一力承擔。新加坡的女士學歷高，不少很難找到伴侶，新一代的獨身比例高，也直接影響到出生率偏低。李光耀就通過所有渠道，為新加坡男女製造機會。這些都成為港人的笑談，但兩地一比，新加坡的出生率遠高於香港，人口老化的社會問題也得到紓緩。

猶記得李國章出任中文大學校長期間，李光耀曾邀請接受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引起一片非議之聲，中大學生會提出「不要專制獨裁，豈

者可以悠閑度日。而香港正面臨政經轉型的困境，整個社會瀰漫着焦躁不安的情緒，特區政府更會招來「議而不決」之譏，港人看見那邊廂的新加坡政府推行政策時大刀闊斧，果斷堅決，因而羨慕不已。

或許，港人都有些口是心非，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心追求民主，傾慕德先生，骨子裏卻可能仍然依戀父權，恨不得有一個雄才偉略的政府打點一切，而不耐煩於事務徵詢民意的政府在一邊婆娑媽，「議而不決」。這就像電台調查觀眾喜歡什麼節目，每每得分最高的是新聞節目，但若據此制訂經營策略肯定要栽跟頭，因為事實上，收聽率最高的總是八卦卦的娛樂節目。

說到底，港人追求民主，鄙視專斷獨裁，卻又不願犧牲效率；港人讚賞新加坡政府什麼都管得井井有條，卻沒想過若特區政府也實行新加坡式的管治，會有多少人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香港人啊香港人，真是難搞！